

画牛随想

潘军

我的出生地是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，当时为县政府所在地。相比农村，我们算是城里人。其实县城与农村大体是没有界限的，一条街走到尽头，便是田野村落。附近农村人平时也不叫进城，而叫上街。这种天然的地理关系，让我们这些县城里的孩子很满意。于是暑假一到，就喜欢去附近一带的农村玩耍。用蜘蛛网去杨树林黏知了，去河湾洗澡、钓鱼，去莲塘挖藕、采菱角、打莲蓬，去田畈拾麦穗、弄麦秸秆当柴火。有时候和当地放牛的孩子熟悉了，还可以赚一回骑牛兜风，胆大的，便在牛背上竖倒立。所以从小，我对牛很亲切。那年代没有什么书看，但鲁迅的那句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却是每个孩子都能背诵的。乙未年秋天我在北京寓所画了一幅《童年》，画面上是两个农村的孩子骑在水牛背上，悠闲地吹奏竖笛，就是对这种经历的缅怀。虽然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田园风光，但觉得去农村可以短暂脱离大人的视线，玩得自由尽兴。“牧童归来横牛背，短笛无腔信口吹。”这是宋代诗人雷震的诗句，题在画上特别合适，遂又多画几张。

那时的县城街面上很少见到一辆小汽车，偶然见到一辆北京吉普，就猜是什么领导下来视察来了。大街上没有红绿灯，也看不见交警，牛是可以随便走的。牛贩子牵着牛到牛市交易，来来往往，牛走得不慌不忙，不惧人色，时而在大街上扑通通拉上一泡大粪。边上人见了，也并不尖叫躲闪，牛贩子不紧不慢地将牛粪捡到粪筐里，带回去，做成饼状，粘到墙上晒干，冬天可以用来烤火。

1975年我高中毕业，插队到距离县城十五华里的平山公社牌楼生产队当知青。起初队里安排我和一位孤寡老人一起放牛。春耕在即，牛是很金贵的，要用来犁田耙地，一天不停使用。待农民歇工吃饭，牛才可以稍作休息。这时候我便把牛赶到山坡上，让它们美美吃上一顿草料。牛吃饱了，精气神就显得足，性情懒的，会卷起身体打个盹；闷骚的会温饱思淫欲，寻衅滋事；脾气暴的还会打架——当地人称“牛顶角”，两头牛互不相让，但也分不出胜负。等我身边的老头凌空打了个响鞭，它们才分散，又下田干活了。使唤牛不是件容易事，当地能使唤牛的把式，都是庄稼地里的能手，颇受尊重。我也曾学过，站到



童年牧笛 潘军 作

耙上，可是牛就是不走。抽上一鞭子，照样不走。心想这牛是我饲养的，我竟不能调遣，很没面子。把式就说，牛这畜生，骨子里带着贱性，别以为你喂它草料他就听你的。你得狠！说着就一鞭子狠抽下去，大喝一声，果然那畜生就温顺得不行，埋头干活了。这真让我唏嘘不已——为什么大家都夸牛呢？

插队的第二年，大队为了便于对几处知青点的统一管理，办了一个林场，把各生产队的男女知青都集中到了那里。场房中间是堂屋，男女分住两侧，每人一间宿舍。堂屋是我们平时开会、吃饭的地方，还配了一名专职的厨子——每天早上我们出工前，厨子都要问一声：你今天吃几两米？他是按人口报称粮下锅，月末结算。这在当时，已经是很好的条件了。虽然没有通电，但还是很满足。

那个时期我画画的欲望十分强烈，在县城有些名气，经常参加县文化馆的一些活动，在街头绘制大幅宣传画。现在到了农村，只能每天晚

上在一盏煤油灯下临摹连环画了。一逢雨天，我就对着几位知青写生。然后再背着画夹四处游荡，差不多把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画了一遍。接下来就是画牛。牛很安稳，所以形象很容易捕捉，几根线条就能勾画出基本轮廓。但是牛行动笨拙，姿态变化不多，画久了又觉单调。有一天，我在一本旧杂志上看见李可染画的水牛—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李先生画牛，就那么看似随意简单的几笔，便如此生动。于是就觉得用水墨的形式来画水牛，实在是很好的选择。那时候很难弄到宣纸，我只能用草纸练习。以后每逢被抽到县里作画，就会向文化馆的老师要上一张半张的宣纸，可又舍不得用。终于有一次下了决心，要用宣纸画一幅牧牛图，结果一笔画下来心就虚了，一塌糊涂，才知道李先生看似简单的那几笔其实是要命的几笔。此后便不再轻举妄动。

1977年高考恢复，我报考浙江美术学院落选，翌年改考中文。画家梦遂被作家梦取代，但一直心有不甘，总觉得绘画不应该走出我的生活。那时候只要遇见好的美展，我都会去看。也注意搜集一些好的作品。大学时代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《徐悲鸿》，所以对徐悲鸿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李可染这样的国画大家，格外留心。这样又与李先生的牛相遇了，这时候眼界也高了些，大致能看出点名堂来。比如能看出那随意简单的几笔，其实是建立在对牛的形体结构理解之上，笔的干枯，墨的浓淡，都有一种韵律感。

1993年春天，我在海口举办“蓝星笔会”，邀请了一些作家朋友。其中老师辈的，就只有汪曾祺先生。笔会期间，汪先生时常会为大家写写画画，并提出来要与我合作一幅。他要我先画主体，然后他来补充。我不假思索，画了两头水牛，随后汪先生几笔一挥，补了雨景，并题“潘军画牛，曾祺补雨”。这两头牛我画得不成功，但这幅画却十分珍贵，这么多年过去，我一直带在身边。如今汪先生辞世已经二十多年，睹物思人，我还是很难过。前几年有个画商想购买，出的润格还不少，被我一口拒绝。

今年的立夏，我画了几头牛。晒在“朋友圈”，大家一片叫好。同城的作家石楠大姐给我留言，要我送她一幅牧牛图。我自然是答应了，画好之后便登门拜访。石大姐很高兴，说你看这三头牛，寥寥几笔，真的就像浸在水里一样呢！

宗谱与宗族人物

富晓春

国史、地志、宗谱统称中华民族三大文献，宗谱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现象，它有其独特的一面，具有其它门类不可替代的文化功能。《梧溪富氏宗谱》最后版本系家父所编修，我受其影响有所了解，但并无研究。我的兴趣点在与宗谱有关的杰出人物上。

富氏集聚地浙南梧溪是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文成县境内的几大主要历史与现当代文化名人都与它有关。北宋名相富弼是富氏的五世祖，南田山泉谷是他的祖籍地。大明军师刘伯温、一代报人赵超构等与富氏宗族都有着姻戚关系。刘基与富弼后裔三代联姻，母亲、夫人、儿媳皆为富氏；赵超构出生于外婆家，梧溪留下他的童年足迹。民国时期，这里还诞生了被誉为“细柳将军”的中将富文。这是富氏宗族的文化财富，也是富氏宗谱最亮丽的人文色彩。

一直以来，虽然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为中心的历史图籍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思想观

念的转变，父系家族世系这种传统的宗族思维也正在发生改变。在一次有关富弼文化的座谈会上，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富弼文化不仅是富弼一个人的文化，它包含了刘基、赵超构，还有富文将军等诸多与富氏宗族有关的其他杰出人物在内的文化。

宗谱是一种刻板的程序化记载手段，它需要有一个宗族或姓氏中特别杰出的人物或文化名人予以支撑。对于这一点，我们以崇尚祖先的心情出发，便不难理解。当然，我们崇拜的对象可以是一位代表性的杰出人物，也可以是一个群体。宗族公认的杰出人物，在平板的宗谱涂上色彩，使之在枯燥乏味的故纸堆中站立起来，这是宗谱所赋予时代的文化意义所在。

著名作家郁达夫曾经说过：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有了伟大的人物，而不知拥护爱戴、崇拜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宗族。富氏宗谱如果没有以北宋名相富弼为代表的文化名

人作图腾，它必将黯然失色，换句话说，它就不可能像现今的富氏宗谱那么有影响，赋予如此深厚的历史与现实双重的文化意义。因此，我认为研究宗谱绝不能忽视对历史人物的挖掘与整理。

如果说宗谱给后人带来最直接的好处，是告诉我们从哪儿来，那么我们对宗族公认的杰出人物图腾的认可与崇拜，它将给后人尤其是宗族带来一种无可替代的人心凝聚、品格传承与精神力量。杰出人物是宗谱内在的精神化身，它赋予了宗族无穷尽的文化推动力。

当然，每一个姓氏或宗族的杰出人物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，它不可能完全取代或代表一个宗族所表达的全部意愿与精神，它必须在缓慢的历史演化与现实传承中不断得以丰富与完善，同时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。

宗族中的杰出人物，是高高飘扬于宗谱百花园中的一面旗帜，它让宗谱有了色彩，有了人文温度，使其在世代的传承中愈发鲜活与灵动！